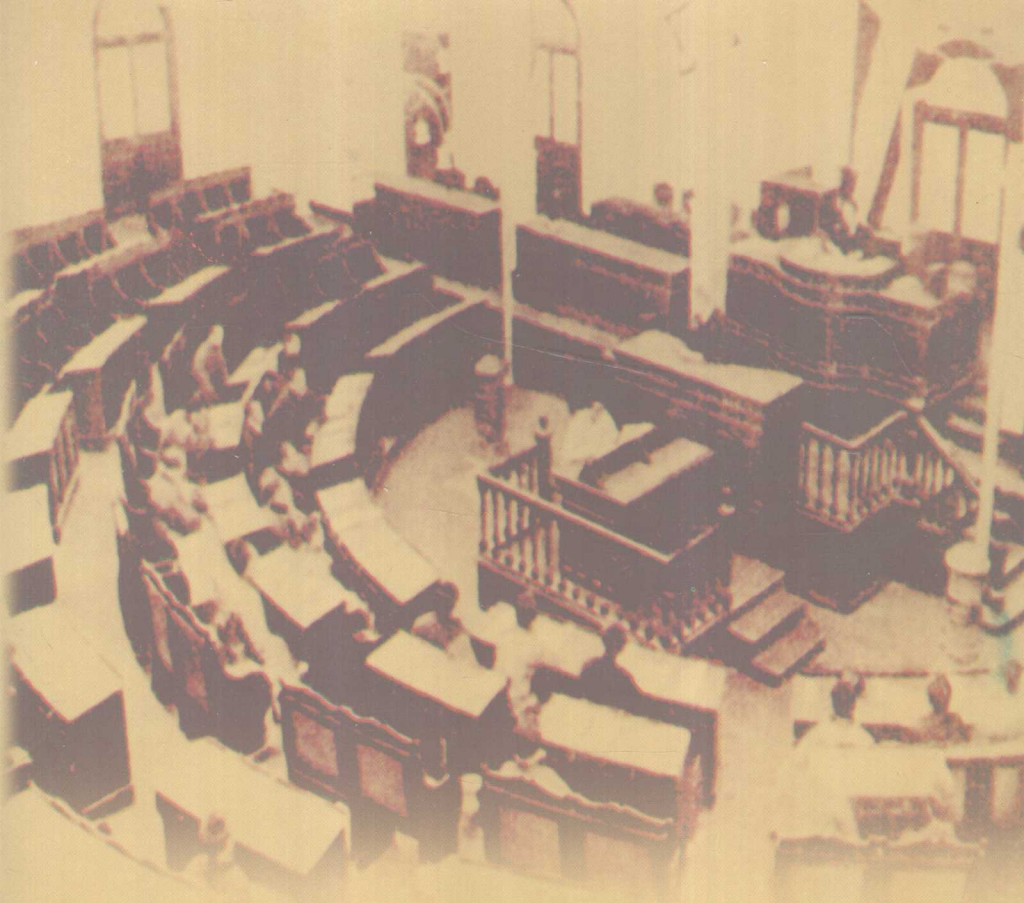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实录

内战烽烟(下)

总主编 © 罗元铮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国实录

内战烽烟(下)

总主编：罗元铮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中华民国实录

总 主 编:罗元铮

责任编辑:刘野

封面设计:白云飞

出版发行: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95846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总 印 张:182

标准书号:ISBN 7—206—02776—8/K·96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总定价:466.00 元(共十五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

提 要

1 月，日本军队制造榆关（山海关）事件。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 日下午，日军首先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向中国守军挑衅，并向南门外哨兵射击。当中方派人提出责问时，反诬中国驻军挑衅。当晚，日军增调军队至南关外。2 日上午，日军炮击临榆县城，并向中国守关军队发起进攻。东北军何柱国所部奋起还击，从而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3 日下午，日军在大量援兵和海空军的配合下攻入关内。日军攻占榆关后，大肆屠杀中国居民，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从此打开了进攻关内的大门。

1 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剿共”具体计划。29 日，蒋介石从南京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红军的“围剿”。30 日，蒋介石在江西省党部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之存亡，要硬干、实干、快干。31 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围剿”计划。

3 月，日军侵占热河省后，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9 日开始向喜峰口中国守军进攻。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长奉令派王长海团前往增援。王团长组织大刀队

500人，于夜晚插入日军阵地，趁日军酣睡之时，挥刀砍杀，一举夺回阵地，次日撤回。而后日军又多次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抵抗，屡挫日军于喜峰口长城线上。但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禁令，守军孤立无援，至5月下旬被迫放弃长城各口。

5月，冯玉祥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榆关事件后，冯玉祥即不断发表电文，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日，严厉指责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8万人。战斗至7月，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但终因蒋介石的多方破坏，被迫于8月9日撤销同盟军总部。中日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派遣亲日派黄郛到北平谋求与日本进行妥协。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除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外，其它条件都可以答应的前提下，于5月30日开始在塘沽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31日双方签订了以中国放弃冀东19个县和两个设治区的统治权为条件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

9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第五次“围剿”。第四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由于中共的错误路线，导致了红军这次反“围剿”的失败。

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以陈铭枢为首的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势力，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举起抗日反蒋旗帜，于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

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全国反帝反蒋之革命势力联合起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法西斯统治。

1月1日 日本军队制造榆关(山海关)事件。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目标指向华北，榆关就成为日军向关内进行扩张的突破口。1日上午，绥中日军向榆关调动，驻榆关日本宪兵守备队将榆关的日侨迁到南海日军兵营。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进行挑衅并向中国守军南门外的步哨射击，哨兵被迫退入城内，中国守军第九旅派人责问，日军反诬陷中国驻军挑衅。当晚，日军一个中队出动南关外。2日晨，日军向临永警备司令部提出：（一）撤退南关中国驻军、警察及保安队；（二）撤退城上中国守兵；（三）南关归日方警戒；限立即答复，否则以武力夺取。临永警备司令部应允南关暂由日方警戒，南关稽查兵暂时撤到城内，待天明调查真相后再交涉解决。日军得寸进尺，要求开放南门，门内及城上均由日军警戒。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竟将南关警察分局局长扣留，缴去警察枪械。上午10时，日军炮击临榆县城，日军3000余人于石河铁桥、南关、二里店、五眼城、吴家岭一带开始进攻。山海关守军东北军何柱国部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禁令，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日晚，日军第八师团长铃木旅团增援。与此同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向张学良提出“警告”，妄称榆关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因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挑起。驻北平日本使馆代办中山会晤张学良，也发出同样“警告”。3日上午，日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动用了重炮和野炮40门、飞机8架、铁甲车8辆、坦克20辆及两艘军舰配合猛攻临榆县城，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中午，日军攻占了南门及东南城角，继而冲入城内，双方展开了巷战。国民党军政当局惟恐事态扩大，不发援军，何柱国部孤军无援，营长安德馨阵亡，全营伤亡惨重。下午

4时，中国守军撤出，临榆沦陷。日军攻占榆关，就打开了进入关内的大门。榆关失陷，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二十九军移防北平东部。宋哲元以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率领二十九军约1.5万人由阳泉等地出发，于20日陆续到达通县、蓟县、三河、玉田一线。蒋介石得到榆关失守的消息，仅发一电致北平军分会，表示对日军侵占榆关“愤慨”。而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则通电张学良，“警告”榆关引起的不幸事件应由张学良负完全责任。4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日军侵略榆关事件，没有提出具体的对策与措施，仅决定“将此事交付各常委会同军事当局负责处理”。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后不断扩大势态。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进攻何柱国部防地五里台附近阵地。同时，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石河阵地。临永警备司令部被迫移到海阳镇，并急电北平军分会要求增援。6日，日军在榆关已增兵达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石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的村庄。驻秦皇岛日军第二特遣舰队司令津田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秦皇岛的无理要求。8日，日本关东军与中国日本驻屯军制定《山海关事件处理方针及纲要》，提出将榆关事件“做为中国驻屯军执行任务的一局部地区问题和以后用兵不受约束的原则处理”，并以张学良所部妨碍日本驻屯军保护日本侨民的任务为由，无理要求张学良所部今后不得向榆关一定范围以内“侵入”。由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日军强占山海关后于3月初轻易侵占了热河，继而向长城一线进犯，华北危急。

同日 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理事王晓籁、史量才、王正廷、杜月笙等21人就职。该会是由蒋介石授意杜月笙等人发起并建立的，筹建时曾称为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为中国航空协会。该协会以“救国”为名，实为搜括民财，扩充用于“剿共”的空军。1月30日，中国航空协会成立上海会员征求总队，由吴铁城任总队长，王正廷任总参谋。总队要求社会、团体、群

众、家庭、个人、学生、工人、店员、职工尽量全体入会，凡人会者必须交纳会费，视情况不同交纳 2 元、10 元、50 元不等。店员职工所交会费由店主、厂主一次代理缴清，然后从职工的工资中按期扣除。

同日 三三剧社在上海成立。该社是在左翼剧联领导下的戏剧团体，曾先后由杜宣、于伶等为领导人。该剧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深入工厂、学校进行演出宣传活动。8 月在为纪念南昌起义的示威大会上，部分剧社演职员工被捕，从此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1 月 3 日 孙科等发起建立中山文化教育馆。由孙科、吴铁城等在上海邀请各界名流 200 余人发起。8 日，由蔡元培、吴稚熊、伍朝枢等 15 人参加召开的第一次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筹委会简章及办事细则。国民党中央执会和教育部于 24 日批准建立该馆，并由国民政府每月拨款 5 万元作为事业补助费用。

1 月 4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抗议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榆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命令日军退出榆关，严惩肇事者，以后不得再有此种举动，保留要求赔偿中方一切损失的权力。外交部还对外发表了宣言，详述了榆关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指出日军侵略榆关是有预谋的，此行动直接威胁平津热河，后果十分严重；要求国联以最有效的方法尽快予以制裁；中国军队将尽全力抵制日军的暴行；并电令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将日军侵榆情况报告国联，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11 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 4 日提出的抗议复照外交部，诬称榆关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向日本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造成的，日方对此“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这一天，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扰乱该省治安或侵入该省内的不逞分子，应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同日，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杀该城无辜平民，促请各国注意日方行

动。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作外交方针演说，公然宣称：“热河为满洲一部”，张学良部下有过越“国境”而进入热河省的行动，热河问题纯属“满洲国”内部问题，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暴行辩解。2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榆关事件再次照会日本政府，驳斥日方来照，并对日军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持械游行及举行军事演习，进攻九门口、石寨等地提出抗议，要求日方迅速将占据榆关及其附近的日军全部撤出，严惩肇事者，并对北平等地日军严加管束，勿令再有妄动。当日，外交部长罗文干也发表谈话，声明：“满洲国”必须取消，中国在东三省必须恢复固有的主权。由于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政府的抗议，很快侵占了热河，使华北局势更加严峻。

1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日军占领山海关的明确目标是占领整个华北，日军在我国其它地区进行军事示威都说明了山海关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中国许多步骤的开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替日本帝国主义清除了武力占领华北的道路，国民党已经投降并且出卖了东北三省。他们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集中了大量的军队对红军进行“围剿”。决议提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加强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进行反攻；在白区，应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反帝反日斗争。

同日 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通电声明结束四川内战。通电称：“国难至此，救亡之责，我辈奚辞，自当团结同胞，枕戈待命”。次日，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致电国民党中央请求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表示愿意率部北上抗日。鉴于刘湘和刘文辉战争结束，国民党中央为调解四川各军之间的内哄，以利一致“剿共”，18日中政会决定派张群赴四川办理善后事宜。2月7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召集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在重庆开军事会议，决定增调刘湘部10个团、杨森部4个团赴川北，

由田颂尧指挥堵截红四方面军。8日，田颂尧到达通江“督剿”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并下达了总攻击令。

1月8日 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公布关于中国东北问题决议草案及说明。该草案及说明书于1932年12月15日通过后，日本代表又提出修改，要求取消决议草案中邀请美、苏参加谈判及说明：书中的“对满洲现在政局维持而承认之，亦不能视为解决之道”等内容。十九国特委会认为调解难以生效，于是把公布决议草案及说明书的时间由原定1月16日以后公布，提前到8日公布。

17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与副秘书长日本人杉村阳太郎背着中国及其他国联会员国达成妥协，擅自对十九国特委会拟定的决议草案及说明进行修改，迁就日方主张。当日，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谈话，表示“如国联强令中国接受不能同意的决议，则政府必致坚决之训令于代表团”。由于其他各国也表示反对，此项妥协案未能正式提出。18日，日本将新提案提交十九国特委会，主要内容为：（一）草案勿涉及“满洲国”之存在；（二）拒绝邀请美、苏非会员国参加调解；（三）中日纠纷以直接交涉为原则。十九国特委会当天讨论了日本的新提案并发表公报，提出如果取消邀请美、苏加入调解，日本是否准备接受决议草案，要求日本在20日前给予答复。20日，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召开会议。日本对该特委会18日提出的征询没有答复。中国代表团获悉该特委会对原决议草案及说明书要进行修改，针对此事发表声明：“中国代表团所坚持之最主要点之一，即否认并废止所谓‘满洲国’之原则，应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邀请美、苏参加调解非常必要；若国联仍然主张直接交涉，仅由特别委员会从中调解，中国代表团仍然不能接受。同时将1932年12月26日致国联秘书长的备忘录公布于众。21日，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再次召开会议，了解到即使按照日方要求取消原决议草案中邀请美、苏参加调解，日本也不会接受原决议草案，而日本所提的种种修改意见，特委会又不能接受。因此特委会决定宣告调解失败，并根据

1932年3月11日大会的决议案，由德、英、法、意、捷克、瑞士、瑞典、比利时、西班牙组成九国委员会起草报告书，同时声明仍留有调解余地。九国委员会于本年1月23日组成。

1月10日 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据日本电通社报道，蒋介石密电指示张学良：榆关事件不谋解决，对内政外交及热河防备均有招来不利形势的可能；如果张学良有武力收复榆关的希望，可积极进行，否则可通过外交途径同日方交涉，由中央来处理，地方交涉要给中央交涉留有余地。

同日 北平军人反省院“政治犯”致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扣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致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控诉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严刑拷打以及揭露反省院肆意虐待的大量事实。尔后又再次致函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扣押人员参加抗日，希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释放一切政治犯进行斗争。

1月12日 西南政务会决议筹建组织西南国防委员会。西南政务会从16日起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东陈济棠、邹鲁、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林云陔，广西李宗仁、梁朝玘、马君武，福建李孝侯、赵一肩，云南张冲，贵州杨秋帆、甘嘉仪，四川张明九、但懋辛，湖南戴静园，冯玉祥的代表王建屏，胡汉民的代表胡木兰，热河义勇军代表何民魂等。会议决定：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西南大联合，筹建西南国防委员会等。

1月16日 立法院长孙科及第三届全体立法委员宣誓就职。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马寅初，傅秉常等90人为第三届立法委员。次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是日，各委员就职。20日，举行第一次大会，由孙科选派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36人，委员长由孙科兼任，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宣言驳斥了蒋介石所谓的“中国苏维埃的存

在，使国民政府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的谬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宣言还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在保卫中国领土完整及国家独立的条件下，愿意同国内任何武装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出席会议的有：蔡元培、鲁迅、周建人、邹韬奋、胡愈之、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吴汉棋、陈彬龢、许申、林众可、王造时、郭慰然、郑大朴。会议通过了宣言和分会章程，规定该会主要任务是：反对国民党对革命者的监禁、酷刑和处决，营救被捕的革命者，给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公民权利和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龢、胡愈之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1月18日 蒋介石通令各省加紧“清乡”和整顿民团。并于22日向豫鄂皖三省“剿共”部队发出特急令，限期“剿共”部队肃清“残匪”。蒋介石在特急令中讲：“限期肃清‘残匪’已三令五申，各部兵力十倍于‘匪’……‘残匪’猖獗如故，言之痛心。现限期已到，望各将领督饬所部，淬励精神，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同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剿匪’区内民团整理条例》。

同日 山西太原警备司令部召开治安会议。会议制定了对违法者镇压办法九条，主要有：无论军警宪工商学各界有捏造黑白，谣言惑众者，逮捕枪决；凡关于交通设备如电线、桥梁、道路等有故意破坏和盗窃者枪决；凡未经许可集会结社妨害治安者枪决；凡不利于治安的“反动”宣传及“煽惑”民众的印刷品，一经查获印者及承印者，一律枪决。

1月19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规定：各大城市一律设立由党政军警机关派员组织的新闻检查

所，凡有关军事外交秘密以及治安方面足以“动摇人心，引起暴动”的新闻，一律扣留或删改，各地新闻机构违者依法处分。20日，内政部宣布：凡未经申请登记而出版的新闻杂志，各省市市政府有权停止其发行。

1月20日 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于1932年11月由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筹办，集股10万元，于是日成立。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为副总经理，蔡声白、王志莘、史量才等为理事。2月9日，该公司正式营业，主要以寄销方式推销国货。1934年，又成立了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作为向全国范围推销国货的中心机构，统一采购办理货物，向各地国货公司寄销。此外，在郑州、长沙、广州、西安等地亦成立了中国国货公司。

1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赴粤。黄绍竑的任务是向西南当局传达中央“安内攘外”方针，动员广东、广西两省出兵江西“剿共”。25日，蔡廷锴抵广州出席西南政务会，发表谈话，表示一旦中央令下，立即率兵北上抗日。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竑等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第四集团军及十九路军各抽一部分兵力挥师北上抗日，粤、桂、闽增兵入赣进行“剿共”。

同日 《江声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惨遭杀害。刘煜生只因发表了《时代不是时代》等五篇反映农民和劳工痛苦生活的作品，即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宣传共产主义，于1932年7月被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拘押，经密呈军事委员会核准，是日以“宣传共产、背叛党国”罪名将其杀害。在刘煜生被非法拘押期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强烈抗议，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宣言，要求国民政府依法惩办杀人凶手。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亦相继为刘煜生事件发出抗议。2月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顾祝同枪杀刘煜生事件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在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

致”。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人员免职，依法惩办。同日，上海市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政府严办顾祝同，并组成刘煜生案专案委员会。北平、安徽、杭州、徐州、芜湖等地的记者公会及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也分别发电为刘案抗议。9日，胡汉民为刘煜生被杀事件致电林森、孙科，称：数年来人民言论出版居住自由已被军人剥夺，要求“为死者求昭雪，为生者求保障”。

1月26日 中共中央致信东三省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中共中央在信中对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的状况做了分析，阐明了目前东三省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指出东三省目前反日武装力量主要分为四种，这些队伍的社会成分、政治领导、社会影响等情况都各自带有不同的色彩，并针对各种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信中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三省的首要任务，即必须坚决地为夺取和巩固共产党在东三省的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三省的反日游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要广泛的团结、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反日力量，组成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反日斗争。信中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断地发展，巩固在东三省的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和巩固东三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党在东三省的反日斗争取得胜利。6月9日，中共中央将此信公布出来，并附短语，指出：“中央认为把本年1月给满洲党部的信公布出来是必要的。”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组织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等策略适宜地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去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1月29日 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1月21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代表彭醇士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促请其早日到江西坐镇指挥“剿共”。29日，蒋介石自南京到达江西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共中央苏区

进行第四次“围剿”。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之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金石”，号召所属部下要“硬干、实干、快干”，要下有“匪”无我和有我无“匪”的“剿共”决心。3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军事会议。前敌总指挥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二十六军总指挥孙连仲、“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二纵队总指挥吴奇伟、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韞珩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拟订了“剿共”具体计划，决定江西全省进行动员“剿共”。为了加强“剿共”军事力量，2月2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捐款购买飞机，党、政、军、警机关人员以半年实发薪金的若干成捐助，勤务、公役人员均不例外。铁道部为满足“剿共”军事运输的迫切需要。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决定提前修筑浙赣铁路。3日，蒋介石在南昌视察赣粤闽三省“剿匪”总部，并训话重申：此次“剿匪”关系到革命成败，民族存亡，希望大家实干、硬干、快干，立功立业。6至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湖北省绥靖主任何成浚、第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郭炳生、总部参议马青苑等商讨“剿共”军事问题。宣布自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任陈济棠为副总司令。调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全军到江西剿共，决定组建南昌行营以统一指挥“剿共”作战。

1月30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由杨杏佛到北平组织，并发展会员40余人（包括美籍3人），于是日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以同盟总会所制订的分会章程为章程；要求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其它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积极设法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监禁的政治犯；要求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会议选举胡适为北平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选举胡适、李济、许德珩、马幼渔、成舍我等9人为执行委员。31日，胡适、成舍我随同杨杏佛到北平陆军监狱军人反省分院看望被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以中国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未经许可为由，通知军警机关不予登记备案，并呈中央核示。2月3日，国民党中央复电称：“所谓保障民权分会包庇共党一节，仰先设法防止为要。”

本月下旬 北平民众反对北平古物南运。1月21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书古物被运抵南京，22日、23日，北平工联及北平各团体救国会通电反对。北平民众于23日在中南海成立了保护古物协会，由周肇祥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运。31日，北平故宫古物3000箱预定当日启运南京，遭到北平民众的强烈反对，搬运工人拒绝搬运古物而未运走。北平各民众团体致函国民政府，要求政府以抗日救国为重，不必急于迁移古物。鲁迅特为此事撰写了《学生和玉佛》、《崇实》两篇文章，揭露国民政府只要古董、不要人民的倒逆行径。2月6日，行政院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不顾北平各界群众的反对，将故宫古物2180箱首批运往南京。6日，天安门至西车站一带沿路军警戒严，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主席周肇祥被捕，直至22日古物运抵浦口才予以释放。至5月，北平故宫的古物被分成五批运走19560箱，运费达43万余元。

本月 中国各界人士反对日军侵占榆关要求抗日。日军侵占榆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5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的守失关系到华北的存亡和中国的安危。要求即日宣布对日绝交。6日，国民党西南中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对榆关事件局部谈判。国民党西南政务会向驻国联代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发电声明，国联应对日军作有效制裁，如事态扩大，国联应负其责。上海市商会、上海地方协会致电华北军政首领张学良等，要求他们积极率部队抗日御侮。南京各界亦举行紧急会议，通电全国誓死抗日。8日，各民众团体纷纷电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辽宁、吉林、黑龙江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通电全国各报馆，号召海内外各界同胞捐钱捐物为抗日出力。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湖南人民抗日会、广东学生抗日会、上海教育会、上

海特别市民联合会、上海全浙公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平津各工会联合会、平绥路工会、福建民众救国会等民众团体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10日，天津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成立，致电国民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抗日。上海大学生会致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要求当局即刻宣布对日绝交，从全国抽调军队抗日。海外华侨团体亦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要收回失地，并表示华侨誓为后盾。11日，南京工界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向全国通电表示要一致誓死抗日，同时通告工会会员抵制日货，禁用日货，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国各地军界人士反对日军侵占榆关，纷纷要求出兵抗日。冯玉祥、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请缨抗日，明确表示愿率本部队北上抗敌。曾在1932年底被日军重兵包围遭袭击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军领袖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从苏联发电致国民政府要求政府“翻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应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同时要求政府援助回国，率部队抗日。18日，广州空军队长丁纪徐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率领本机队北上抗日。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及师长刘戡、戴民权等，均先后分别致电国民政府或军事委员会要求抗日。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

2月1日 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自英国返抵南京就任。他两次访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解释英国国联代表西门在国联大会对中日问题的态度，称英国并非有意袒护日本，实因“各小国一致反日，英国不得不取大国立场，以调剂会场空气”。次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袒护日本和对西藏存有野心，声称：“英帝国政府及印度政府始终没有对西藏自由行动之野心；对于中日纠纷从不以西藏问题为左右而对日本持袒护态度。”

2月2日 西南政务会组建西南国防委员会，公布该会组织条例。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林云陔为